

現代名著譯叢③⑨

托馬斯·摩爾

Raymond Wilson Chambers 著 ■ 梁懷德譯

東西文化交流基金會審稿小組校訂



現代名著譯叢③⑨

托馬斯・摩爾

R. W. Chambers 著・梁懷德譯

東西文化交流基金會審稿小組校訂

現代名著叢書 39

托馬斯·摩爾

A11008-39

82.01.1454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元月初版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R.O.C.

定價：新台幣280元

著者 R. W. Chambers
譯者 梁 懷 德
東西文化交流基金會審稿小組
發行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 話：3620137·7627429
郵撥電話：6418662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873-X (平裝)



This translation of *Thomas More* by Raymond Wilson CHAMBERS,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, is sponsored by the Foundation ENCOUNTERS EAST WEST CULTURAL EXCHANGES of Montreal, Canada.

The present Work is No. I of Series IV of the Collection of ENCOUNTERS.

The Series of the Collection are: I. Education, II. Ethics, III. Religious Thought, IV. Lives, V.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Treatises, VI. Literature.

本譯作由Raymond Wilson CHAMBERS所著 *Thomas More* 逐譯而成，原書以英文寫成。

本書屬加拿大「東西文化交流基金會」所推展的譯書計畫「系列四」的第一本譯作。今列於聯經出版公司的「現代名著譯叢系列」。

該基金會的譯書計畫涵括以下六種系列：一、教育，二、倫理，三、宗教思想，四、傳記，五、哲學及社會學論述，六、文學。

「東西文化交流基金會」的地址是：

加拿大：2715, Côte Ste-Catherine, Montreal, Que.
H3T 1B6 Canada.

台 灣：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貴子路21號

電話：(02)9017912

關於本書

十六世紀初，《烏托邦》問世後，不知有多少人為作者的構思與意念神迷不已，數百年來聲譽不曾稍墜，一直是舉世知名的經典之作。二十世紀中葉，英國學者錢伯斯（Raymond W. Chambers）為該書的作者立傳，以高度的人文主義觀、典雅暢達的文筆寫下了摩爾的一生。如今這部傳記透過譯筆呈現在中國人的眼前。

「東西文化交流基金會」（1985年成立於加拿大）對於能以這本譯作作為它發展文化交流的開路先鋒，感到十分滿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在我們的心目中，論西方現代「思想」及「生活」，西方近代人物裡，沒有人比摩爾更適合列於我們譯書系列的首席地位。

摩爾身為英王亨利八世的掌璽大臣、地位崇高的大法官、伊拉斯默斯友人中的翹楚，以豐富的著作，也以自己一生為典範，開啟了「現代」之門。論著作，《烏托邦》最叫人愛不釋手；論生平，他一生心繫同胞的需要，忠執於自己的宗教原則，並深覺應該與國家及同胞分享他的這種信念。智慧使他寧死不

背棄原則；信仰讓他敞開心靈，迎向「啟示之神」（God of Revelation）和祂的教會、迎向那超越的生命境界。時至今日，在那塊他曾飽受苦難的土地上的英國人，對他的懷念與愛戴還是有增無減。從他在獄中寫的作品《論受難》（*The Treatise on the Passion*）中，可以窺見他深刻的靈修經驗，他的同代及後代漸漸也從此體驗出他從容就義的精神源頭、他對神恩的倚賴與信任。

為摩爾立傳的人很多，或寫其聖潔生活，或寫其殉道事蹟。如今我們呈現給讀者的這部傳記，對表揚他的偉大，可說功不可沒。這書凸顯他的文化素養與人文精神，藉此一探其更深一層的生命原則。作者錢伯斯以莎士比亞戲劇形式來架構整部傳記，分五幕完成。摩爾的生命雖以悲劇終，卻傳出希望的訊息，並肯定人類更高的價值——足以叫我們為其生、為其死的價值：因此他對基督教所賦有的「展望」作了見證。

中華文化也不乏這類典範：人文主義特質、文化素養、忠貞的氣節以及對人類更高價值的執著。或許摩爾要在遠東尋找知音，並非難事；他的命運也許能激發此間人們的同情與感佩吧！

我們所選擇的傳記作家錢伯斯，是圖書館學家兼古英語專家；他筆下表現的高度史學精神和人文哲學風格，可能有些出人意表。想來當初他之所以受摩爾吸引，是本著對首批近代英語作家的好奇心使然；也許後來他對摩爾衷心折服，不僅因為自己透過著作的字裡行間體認、細辨了這一代聖哲的本來面目，也因為四個世紀以來多少攻擊摩爾的苛評，在他對摩爾生平及著作的銳眼分析徹照下，發覺若非十足令人難以忍受，也極不

公平。然而，錢伯斯沒有選擇為摩爾辯白一途，祇是平實寫來，信實述完，讓心目中的英雄自己現身說法。他的這種作風，也正是從摩爾身上習得的——仁厚的精神、政治家風範、信德的楷模。

遍觀這部審慎考證之下的作品，隨處可見作者在靜觀默想中分潤了摩爾的見解與抉擇，並不時加上幾筆自己的慧見，字字珠璣。到了末篇，錢伯斯才把「劇」中人物一一置於適當的觀察角下，細細評估；他沒有披上博學大儒的袍子說教，卻不著痕跡地點出了這齣「活劇」發人深省的教訓。讀者若是用心閱讀，一路讀來，到了末篇就能夠了悟摩爾對西方的意義、摩爾對歐洲歷史和使命所具有的洞察力與遠見，說不定還藉此意會摩爾傳遞給東方的訊息。希望如此！因為此刻東方正將目光投注於西方，為自身的進步尋求新力量。摩爾彷彿告訴東方：瞧！你們眼中所見的西方，並非全是裨益與成就，歐洲還有一個更偉大的訊息要給你們，絕不在強權與財富的貪婪上！摩爾（我）正是為這偉大的訊息而死的！巧取強奪的貪婪之路並不能引人走向自由與進步啊！四個世紀以來，歐洲土地上大小征戰不斷，加上新近兩次世界大戰，不正是最佳明證嗎？每次戰後留下的，祇是毀跡斑斑，祇有恨意難捺，而舊仇祇能蓄成新恨！學校裡的歷史課本往往祇陳述一個又一個悲劇性的史實，可能未必與讀者分享一種清醒嚴肅的智慧史觀吧！

摩爾教導我們：凡此種種並非不可避免。他為心中的真理與信念而生、而死。摩爾的追隨者——許多在英國、在全歐，繼而遍及全世界——也舉生遵循這些真理與信念。其中最容易

讓天下人接受的信念之一，便是摩爾所主張的面對國家，人有「個人的良心自由」；但他絕對不主張人有權利做煽動叛亂的言論或行動，有權利製造無政府的混亂狀態——這是摩爾的信念之二。第二項信念與第一項信念同等重要，知其一不能不知其二，至今兩者往往被視為同一信念。在此，摩爾邀我們對他的「自由」信念再做一番省思。

另外，更重要、更基本的是要了解：摩爾是歐洲文明與文化的承傳人。這脈文明、這脈文化，不僅貫穿全歐，也貫穿英國本身；它是在「基督教世界」(Christendom)裡成長的，而在它成長之際，歐洲各國均為「基督教世界」的一分子，結合在一個大共同體之內，涵化於同一文明、同一文化之中。從來沒有任何一洲的民族像基督教的歐洲那樣，文化果實豐碩得讓他們急於到海外去與人分享。沒想到劫掠隨之而至！原本為與人分享文化及宗教果實而出航的理想被推翻了，取代的是海外拓殖大賽與帝國擴張大競技。歐洲歷史由是有了不幸的複雜「情意」。文化並未單獨旅行，可惜！

不管怎麼說，摩爾仍是在信仰裡找到人生原則的。沒有觀照這個基本事實，就無法對他的歷史角色、他的著作、他的價值觀、他的抉擇……，作真切的解釋。錢伯斯沒有擺出說教面孔，而是以史學家和文化人的立場點出這個事實，也正因如此，訊息傳達得更有力。摩爾的宗教信念是：教會（天主教會）是神意建立的，他為這個信仰而犧牲生命。沒有這樣的信仰，歐洲就不會有「基督教世界」的存在，就不可能有倫理道德觀的提昇，也不會有修院制度的發展與大小教堂的林立，遑論藝術

與音樂、科學與思想在兼容並蓄的大文化裡蓬勃茁壯！為什麼？因為這脈文化建基於信仰之上，它相信至高無上的造物主、它相信至高神帶給人類的訊息。這是個兼容並蓄的文化：它不強制，祇求散布；它不劃地自限，但求澤及普世；它不封閉，而是敞開大門，迎納遙遠的人。沒聽說過基督教國家受限於自己的信仰，或受信仰所驅而征戰的，若是如此，當事國已經喪失了它身為基督信徒的意義了。

錢伯斯再三強調，當年歐洲的三位年輕人——英王亨利八世、法王方濟一世、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——原本可以克紹箕裘，將他們共同的文化遺產帶進「近代」，然而反倒選擇了註定毀滅的命途！第二次大戰後，如果錢伯斯還活著的話，一定會注意到：在這世界悲劇發生後，三位偉大的歐洲基督徒——德人阿德諾（Konrad Adenauer）、義人德·加斯貝利（De Gasperi, Alcide）、法人莫內（Jean Monnet）——以他們的理想與基督人文觀，幫助戰後的世界重整自己、定好方向、再復生機。祇有世人的貪婪與短視，才能把他們的目標與工作成果毀於一旦。在東方，蔣介石與「協約國」的幾位偉大領袖攜手合作，參與戰後種種復建計畫，一齊為人性的提昇而努力！

這些夢想也正是摩爾的夢想，更是根植於他內心深處的信念，他不惜以死為證。他知道：不違背自己的信念絕非背棄他的君主，因為君主也該依循與他相同的信念而活！不如此，國家社稷百姓蒼生以及他本人都沒有前途可言！

在此，我們請了東西方各一位學者為本書作序：

一、〈千秋人傑〉

vi • 托馬斯·摩爾

——Rev. Germain Marc'hadour

二、〈涵泳儒家風範的摩爾〉

——陳文團教授

千秋人傑

歐洲人當中，最堪勝任與東方進行文化交流者，除摩爾外，實不作第二人想。下列幾項事實足可證明他無遠弗屆的吸引力：以馬來文寫的摩爾長篇傳記已經發表；自1929年起，摩爾的《烏托邦》已有三種日文譯本問世，總銷售量超過一百萬份；弗烈德·辛涅曼（Fred Zinnemann）所著的《良相佐國》（*A Man for All Seasons*，譯者按：原文應譯作《千秋人傑》）在東方廣受讚譽。在所有的十六世紀歐洲人文主義者當中，對歐洲以外國家最感興趣的，莫過於摩爾。在他的英文著作裡，屢屢提及新發現的國家與其人民；他的《烏托邦》亦屬遊歷見聞錄，書中所談的島國，在地理上與自己的國家互相對蹠，在文化上亦與他本國的風土人情迥然不同。

摩爾對當今西方的影響之巨，也由下列幾項事實顯露出來：在1945年間，摩爾作品還找不出一本夠得上水準的版本，想出版一份專研摩爾的學報或專刊根本不可能；然而，二次大戰後，研究摩爾的專著竟增加一倍以上。固然，戰前已有以此名目成立的基金會，有助於獎勵，及提昇對他的研究水準；而錢伯斯

(Raymond W. Chambers)在這方面實至名歸，貢獻至大。早在1935年教會尊摩爾為聖人之後，他就成了眾人敬禮的對象。二次大戰使摩爾黯然晦迹數年之久，不過，從一方面看，戰爭著實延緩了眾人對這位英國英雄的再度發現；從另一方面看，引發此次大戰的獨裁國家，卻在無形中勾起了人們對於正道直行之士的懷念，懷念他們剔透的心靈與沛然的正氣——足以禦強權、抗暴君；也懷念那些寧可喪命也不願喪失個人「存在之理由」(raisons de vivre)的人中豪傑。由是，戰後德國以聖多默·摩爾為主保的教堂，不知凡幾；基督的子民欲藉此作為補贖，因為他們在戰時對納粹意識形態的抗拒，遠不如摩爾當年對亨利八世的抗爭來得堅定。

波特(Bolt)的戲劇與辛涅曼(Zinnemann)的電影成功的理由之一在於刻劃得恰如其分。劇中的摩爾是個因良心異議者、一個審慎的殉道者，他以言辭維護真理——願意和顏悅色地講道理，也準備以鮮血喊出真理(譯註：殉道)。就憑他這種對「自我」、「人格獨立」與「責任感」的堅定自覺，絲毫不退讓，摩爾，這位千秋人傑恰恰是「應時人傑」。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，種種跋扈的勢力——無所不管的政府，以及左右民意的大眾傳播——在在使個人有受制或受窒之虞。

也正因這是個變動的時代，事事皆變，急遽而劇烈的變，摩爾確然應乎此時之需。因為，在摩爾所處的時代裡，地理新發現與古典(即基督之前的)文化的再發現，撼動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歷久不變的理論基礎，同時也造成了一種氣氛。在當時那種氣氛下，沒有哪件事聽來是荒唐可笑的。烏托邦的故事被

當做實情報導；正統信仰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後，異端邪說竟紛紛而起。再加上印刷術的推波助瀾，以往的聽覺上的——說的文化，一變而為視覺的——看的、讀的溝通形式。今天這個時代又何嘗不然？當世界的界線不斷地往後移，而「深層心理學」(depth-psychology) 探入人類的靈魂，勘測早先未知的領域時，人們已打算接受不可思議的一切了。

轉變期的特徵是：不平衡。當舊的平衡逐漸瓦解，新的平衡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取而代之。摩爾處於當時那種心智一片混亂的時代環境裡，從未迷失自己的方向。在《烏托邦》一書中他寫道：葡萄牙的水手們把磁針、指南針引入烏托邦。這點極具象徵意義，象徵摩爾本人一生堅守自己的行動方針；海市蜃樓的幻境欺惑不了他，堅定不移的信念之星只引領著他，對天主始終如一的信仰支持著他。身為教「內」改革人士，摩爾欲換新歐洲文化與精神浴池中的水，而沒有將池中的嬰兒隨著舊水一併丟棄（譯註：摩爾欲「汰粕存菁」，而不願「玉石俱焚」）。新觀念、新事物固然嚇不倒摩爾，他牢牢固守著基本的原則與信條；摩爾的胸中殿宇，是建基於磐石之上的。反觀今日這個混亂的時代：沒有任何價值標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，所有的信條與德行都要遭到挑戰。因而西方人在尋找堅實不變的陸標、堅定不移的北辰以及像摩爾那樣的典範——富創造力、有迎接變化的氣度胸襟，同時又能證明自己（套句波特的話）如巨巖之不移。

西方在「懷疑大師」(masters of doubt) 如佛洛伊德(Freud) 和尼采(Nietzsche) 強而有力的衝擊之下，至今猶搖晃不止；

西方現在需要「肯定大師」。當初比拉多（*Pilate*）錯把真理當神話，問道：「什麼是真理？」如今大家卻問：「真理在哪兒？」摩爾深信真理所特有的、與生俱來的生命力——「真理的力量」（*Veri vis*）——如他在《烏托邦》一書中所寫的。此外，他也深信：祇要假以時日、予以適當的時機，真理自會出現，是擋都擋不住的。因為，永遠是「時間」在「考驗真理」（*Time tries truth*）：這是「多默·摩爾之友」（*amici Thomae Mori*）會社的座右銘，也是他自己的話，反映了摩爾信賴真理必勝的樂觀態度。

我們這個世紀，不僅是個人反抗「壓力團體」下達命令的世紀，也是個殉道者的世紀。最近這六十年來，為宗教理由以身相殉的人士，多過以往任一個世紀。教會予以殊榮、紀念他們時，非天主教徒也欣然同慶。為了表達犧牲成仁的殉道理念（*the idea of martyrdom*），人們或在教堂裡設立聖壇（如坎特伯利大教堂 *Canterbury Cathedral*）；或在教堂玻璃窗上畫設圖案（如撒爾斯伯利大教堂 *Salisbury Cathedral*）。這些實踐殉道理念的現代鬥士，分別代表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不全是基督徒：例如甘地、馬丁·路德·金恩、桃樂西·戴（*Dorothy Day*）、奧斯卡·羅米羅（*Oscar Romero*）、泰特斯·布蘭馬（*Titus Brandsma*）、伊迪·史丹（*Edith Stein*）與戴瑞克·潘霍華（*Dietrich Bonhoeffer*）。

然而，托馬斯·摩爾的殉道別有一種非凡的特質。因為，摩爾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脫逃叛國的死罪：他的中產階級環境；他的「公民哲學」（*civil philosophy*）主張：避免正面衝突，

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容忍之；他總是根據信念而對立法者抱著寬容的態度；他不愛特立獨行；還有他的家族關係和家庭責任。再說，他並未企求倚恃教宗的權威以渡過難關，不像教宗碧岳九世（**Pius IX**）在位時，贊成教宗有絕對權力的人士，以武力護衛教宗的國。摩爾從小到大一直以為「大公會議」的權力高過教宗，直到1527至1533年的危機——英王亨利八世為了「離婚」而自任對英國教會有絕對的權威——才促使摩爾研究這個議題，終而得到結論：教宗的職權乃是神所授予的（譯註：教會是耶穌基督建立的；祂授予第一任教宗伯鐸（**Peter**）權柄，教宗在教會內始有神權。因此，摩爾並非為一己之見而喪命，而是為了徹徹底底的信仰而犧牲；也就是說，他深信：羅馬教宗在教會內的首席權乃是出於基督的旨意，所以唯有神職人員堪當教會之首，非神職人員如國王者是斷斷不行的。

差異極大的各種文化、不同的歷史及神話，彼此不容易涵化；不過，一個具有踏實而兼容並蓄的人格，且自身是一個大公性人物，則容易與人溝通自己的文化。兩位偉大的藝術家為摩爾繪像：伊拉斯默斯（**Erasmus**）在連續四封信裡描述摩爾的外貌、心靈與習慣；賀爾班（**Holbein**）則在四幅畫裡寫真神形。後代的人由此熟悉他的形貌，即使在千古之後與他神交默談，亦不是難事。此外，摩爾早在他的時代裡活出了現代生命的幾個特徵：他在都市裡長大，進了大學，成為專業人士，參與國家決策過程，曾成家，督導孩子的課業；曾為公事，或休閒而出國旅遊。

時至今日，構成報紙頭條新聞的種種問題，也還不出當年

摩爾在《烏托邦》裡一一提出的那些問題。《烏托邦》是社會病情的診斷書，也是提供可能補救辦法的通風口，因此，它可算是政治辯論的鼻祖。《烏托邦》也是理想聯邦的實驗小模型；烏托邦內沒有戰爭、不平等，也沒有無知與貧窮。它對窮人的關懷——用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話，窮人是列為「優先考慮」的——並非僅僅產生慷慨大方的慈善計畫，它確實引發對窮人的實際照顧，這樣為摩爾贏得了「窮人最好的朋友」的美譽。

摩爾最吸引人的地方、他獨一無二的偉大之處也許在於：他善於在自身內調處看似互相抵觸的幾項特質，即「靜觀」與「行動」兼顧；「努力」與「祈禱」融為一體；「夢想」與「實踐」兼而有之。摩爾在峭直深刻中融入了幽默感；他講究紀律，也具熱心腸；他用歡樂的語氣談論嚴肅的話題；雖然日理萬機，卻未因此而犧牲天倫之樂。他是個談吐風雅的外交家，也是個言辭犀利的辯士；他是典型的中產階級人士，也是克己苦修的人，甚至是神祕主義者。在巴黎鑄造的摩爾紀念牌上刻著：審慎的單純（*prudens simplicitas*），可謂絕佳的詮釋，因為摩爾這個人集鴿的純真與蛇的機警於一身。他的聖善正是他完整的人格所達到的圓滿之境。

Rev. Germain Marc'hadour

涵泳儒家風範的托馬斯·摩爾

《論語》是最常被儒學者討論的經典之作之一。「君子」此主題主導該書的整個內容，君子所表現的正是人文主義的精神寫照。此外，「君子」亦於《中庸》中被視為儒家的教育目標。儒家所以如此看重「君子」，乃因「君子」被後來學者釋為最完美無缺且理想的人。「君子」誠、仁、和，且博文約禮，致力教育與政事。簡言之，「君子」是人之典範，誠如孔子所言：

子曰：「『君子』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；敏於事而慎於言；就有道而正焉；可謂好學也已。」（《論語·學而篇》）

孔子爾後，「君子」造就了中國的教育；中國教育也塑造了「君子」。迄今，「君子」是儒家文化中最令人欽羨的成品。

然而，君子自始迄今總未受到禮遇，秦始皇的「焚書坑儒」，晚近的「文化大革命」將君子群集於勞改營中加以折磨，毛澤東則將其貶為腐敗之封建社會下的產物，而天安門廣場對知識分子與學生之大屠殺已清楚的說明：「君子」已不再受歡迎，

必須被棄之如敝屣。然而事實上，統治者亦無需訴諸暴力槍殺他們，這樣是膚淺而愚蠢的。不過，今天在自由社會中，「君子」似已衰亡。原因是，我們在這世界上已不再尋求「君子」做為典範。取代君子的是成功的商人、大企業家、運動選手或低俗音樂等新偶像、強力之政者及擁有最新型武器之強者；或者揮霍無度的偶像化男人；沈迷於上流社會中，口中啜飲著香檳，開著飛快的車等不勝枚舉。這些男人經常出現於電視的螢光幕上而胡言亂語，也受好萊塢製片之青睞。今天，我們的教育目的不再是教人成為一個理想的君子，而是導向如此的物質世界。國內新學院的設置也多偏於商工及消費性方面。人性的墮落敗壞，商人階級的抬頭及其勢力之高漲，對知識分子之藐視等，在在確定「君子已亡」之事實。四百年前，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把科技引進中國的同時，發現了君子的崇高理想。他自己試著作個君子，以商業名詞言之，他已做了很多有關以商業易君子的交易。他知道君子是能代表耶穌基督的最佳形象，他毫不遲疑的宣稱儒教能領導基督教。其言不差矣！所有的人，包括西方與我們，成為君子的第一步便是必須遵循君子的理想而為之。再者，即指具聖哲特性，擁有孔子所稱之「內聖外王」特質者。

然而，利瑪竇之言，於今天也未必全是對的，因為他未預見中國是如何放棄君子而追求成為當代商人的過程。更重要的，他並未發現權力與君子之意識型態掛鉤的危險性。儒者把君子選為意識型態的模本時，他們已把君子轉成為其服務的工具。如此，他們忽視了他們正自掘墳墓的事實。事實上，孔子本人